

专题

◀ (上接5版)

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是，关于理论体系的集中研究是在此之后。受1956年苏共二十大意识形态波动影响，以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需要，我国特别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从1958年到1961年，毛泽东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戚义明：《“大跃进”后毛泽东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建议中央各部门党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组织读书小组读政治经济学。他与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在组织读书小组在杭州读书期间，他在信中说“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5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高潮。编写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学者的努力方向。薛暮桥回忆：“1955年，党中央宣传部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和于光远、孙冶方两同志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薛暮桥：《中国经济学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能否写出一本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意味着能否做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指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

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1998年版）毛泽东主席的这一判断，既反映了他对构建完备的理论体系持冷静客观态度；也体现了我国政治经济界以教科书为载体进行理论建构的基本思路；还表明毛泽东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视为实践经验的理论反应，认为理论建构以实践为前提，以总结实践经验为方向。蒋学模先生的教材编写工作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些观念：将教材视为理论构建的载体，教材编写直面理论难题，紧扣社会实践，力图通过研究总结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对此蒋学模先生曾写道：“归根到底，理论是实践的反映，是受实践的制约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成就，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蒋学模：《〈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辅导讲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这一时期，蒋学模先生紧扣实践的教材编写思路，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大成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总结这一经验是教材编写者的重要任务。在读苏联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满意教科书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论断：“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

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统购统销、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这一时期全国各地掀起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高潮，当时13个省编写了14个版本的教科书，1960年到中央党校讨论，会后有两本教材公开出版，蒋学模与姚耐、雍文远等主编的上海版教材是其中之一。1961年，在华东局组织的教材评比会中，这一版教材也被推选为范本（张生：《社会主义的“中国经验”：1961年沪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始末》，《史林》，2016年第3期）。这本教科书的第二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两节系统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详细介绍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形式”（姚耐、雍文远、蒋学模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试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版教材是我国总结社会主义改造经验的早期政治经济学文献，充分体现了紧扣实践的理论创新精神。

长成：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学术前沿的理论集成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和体系构建工作，受“文革”影响基本被打断。改革开放后，1980—90年代，政治经济学迎来第二次理论发展高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文革”之前学者已经围绕如何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一时期推出的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文革”前的理论探讨，此前一些未能实现的体系构建工作得以实现。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于1980年正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1、紧扣实践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过程

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这一时期的教科书编写

提供了全新的实践经验，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突破，为丰富和完善《政治经济学教材》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初步确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结合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邓小平对此高度评价，认为“写出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蒋学模教授也对此高度重视，基于新的指导思想，在修订第四版教材时，把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重新编写。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初蒋学模教授就主持修订了教材，5月份教材第七版正式出版，其中第十二章“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机制”的第三节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确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所共同具有的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范畴，第七版开始把这三部分内容构成的“商品经济”从“资本主义部分”中独立出来。蒋学模教授概括道：“这一次修订，总体结构上的变化，是把原来的《商品与货币》一章，从资本主义部分划出来，作为《对象》之后独立的一章。……主要的变动集中在社会主义部分。修订的指导思想，是力图依照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充实完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教材（第九版）》）。

总之，《政治经济学教材》每两年左右修订一次，每次修订都尽可能地体现实践变化和理论创新。正如蒋学模教授在第九版后记中所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应当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观点、新经验”。蒋学模教授为每个修订版所撰写的后记，成为记录和解读中国经济中改革开放重大变革和重大事项的“改革开放大事记”和梳理相关理论动态“理论发展大事记”。

2、集各派思想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对象、起点、红线和体系

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

义部分的理论框架也是编者所理解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框架。从1950—6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开始围绕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入探讨，也发生了激烈争论。把什么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哪个范畴作为整体理论的逻辑起点，以哪个问题作为理论的中心线索，如何安排整体内容框架，成为理论体系构建的“对象论”、“起点论”、“红线论”和“体系论”。一本教材关于“四论”的回答，也就构成了这本教材在国内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阵中的基本定位。蒋学模教授积极参与了关于“四论”的讨论，将自己关于“四论”的理解认真贯彻到《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之中。因此，虽然教材的13个版本始终锐意创新不断调整，但是基本的理论框架却保持了严格的逻辑一贯性。这是《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理论骨架和灵魂所在。

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蒋学模教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辅导讲座》。此书的基础文稿来自蒋学模先生在贵州省委党校做的辅导报告，是教材前四个版本历次辅导报告的汇总集成。这本书的第一讲就集中回答了关于理论体系的“四论”。具体内容的编写集中概括形成自己的理论叙述风格，使《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体系特征更加鲜明。

蒋学模先生在回答上述四论的同时，也概括了学界关于上述四论的不同观点。这里，就蒋先生对“四论”分歧的概括与自己的回答进行简要梳理，就可以清晰地总结出国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理论方阵，以及《政治经济学教材》在方阵中的定位。

关于“对象论”，蒋学模先生总结，学界存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三种不同观点，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虽然生产力非常重要，部分教材也设专章论述，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是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重的。……研究生产关系，总要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这样两个方面来考察，才能把问题看透”。

关于“起点论”，蒋学模先

(下转7版) ➡



蒋学模手书文稿